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 基础性原理

朱志杰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设计,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蕴涵,为我国提供了一部较为系统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纲,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体系,必须首先弄清这一理论的基础性原理,这对于认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起源、主旨、要义、内容结构和特色都是有益的。本文试图就此谈点看法。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性原理是什么?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性原理,就其对于这一理论的发生而言,是一种原发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就其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是一种统率一切的理论指导;就其理论的层面而言,是一种其他理论借以建树于其上的理论基础。弄清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性原理,实质上就是要弄清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形成基础。

那么,这一基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一段较长时间里我们曾经严重忽视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低推到次要位置甚至搁在一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全党一道进行了冷静的思索。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经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过去我们之所以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就是由于我们不懂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没有看到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完全清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与此有关。

因此,围绕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阐述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局的、长远的意义。他在批判“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时指出:“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进一步对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一是把经济建设或发展生产力当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把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二是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从社会主义评判的高度,把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三是把发展生产力

当做社会主义的首要内涵，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把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经过这些概括，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便升华为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这个原理，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指导性原理，构成为邓小平理论及其经济理论体系中一个奠基性原理，从而为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把钥匙，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都是在这个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对于前人的继承、发展和突破创新，也是以这个基本原理为基础展开的。因此，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经济理论的基础性原理。

同时应当看到，当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的时候，这一原理必须面对中国的实际，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严重教训，不只是在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用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还在于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程度，推行了空想的、冒进的和超越阶段的错误方针。这两种错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左”的指导。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强调，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指出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考虑的特点。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搞现代化必然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并且进一步作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纵览世界形势，把握时代特征的前提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刻画和科学的界定，它表明了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经过人民革命和社会改造，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超越；另一方面，为时代和国情所制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我国还不可能超越生产力的现代发展阶段，不可能超越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全部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就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规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规定了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规定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规定了必须实行与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如果说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则是上一原理在我国现实条件下的具体展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实依据的理论概括。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同样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性原理。

两个基础性原理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和发展。

实践证明，离开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不可能提出和形成的。建国以后，党和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国情不是完全没有了解，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还把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形容为“一穷二白。”1958年大跃进前夕，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指出：“中国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1962年，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¹⁰这些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这些看法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形成对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呢？原因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离开生产力在那里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追求某种空想的目标，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不能离开生产力，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一致性，其社会主义视角是生产关系视角，而不是生产力视角。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你们爱研究生产力，我则专门研究如何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向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¹¹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被毛泽东所承认的缺点，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生产力相割裂为特征的。

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根本视角上的这一迷误，使我们对于国情的认识陷入唯心论。以致我们在看到“一穷二白”的时候，反而认为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一个优点，认为“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一张白纸，正好写字”。¹²“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这一状况，虽然使我们感受到了某种束缚和制约，但我们却认为可以“出政治觉悟”，把人的干劲、热情和意志等置于物质条件之外，试图通过政治激发和群众运动来摆脱和超越物质基础的制约，在当时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的条件下，尽快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¹³并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推行了一套“左”的、冒进的做法。这表明，如果不树立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基本观念，不纠正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视角，我们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所以，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确立社会

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前提。

肯定这个基本前提，从另一方面讲，就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对于认识国情、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作用。因为当作基本前提的这个根本视角，其实就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这一原理确认，一定物质生产力，总是一定社会的基本物质条件，它在这个社会的有机体内是对各种关系和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形态都概莫能外。这是划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石，是我们观察世界、认识国情、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工具。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便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ABC讲起，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意义，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高度提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或者把发展生产力当做社会主义归根结底的问题。从而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发展为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廓清了笼罩在当代社会主义上面的空想迷雾，使我们获得了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认识，把社会主义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联系，把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和使命放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上来对待，建立起对社会主义现实发展过程观念，为提出和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理论准备。而且，这一结论确认生产力发展是认识和评判社会主义的根本尺度，也同时是确认生产力发展是认识和划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根本依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和质的规定性，正确地决定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和阶段，这样，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以及初级阶段的诸多特征也就获得了确定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一根本原理作基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便不可能一开始就跳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什么和它处在什么发展阶段的问题上来，在认识逻辑和行动逻辑上都不可能有个跳跃。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丝毫的轻慢，不能认为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可以撇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应当看到，这两个基础性原理中的前一原理，是在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性品格，这一品格同马克思主义其他真理一样，都要求将其实践性贯彻到底，把自己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印证和实现，以形成对现实世界的规律性认识，成为人们在实践中可以清晰认识和直接把握的具体真理。后一原理就是从前一原理发展而来的具体真理，它们前后相承，共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提纲挈领的回答。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揭示了社会主义作为客体对象的物质内容和物质条件，规定了我国作为实践主体的活动或根本性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我们端正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视角，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建设方针。在这个意义上，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做的回答，既是基本的、重要的回答，同时又是一般的、共性的回答。要拿这一原理指导我国的具体实践，就需要进一步使之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如果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进程，不了解社会主义的物质内容和物质条件在历史和现实制约下所能实现的实际发展状况和程度，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不能说是清楚的。这就要求进入社会主义的实际过程来具体把握和认识社会主义是什么，正如要在事物的运动形式上，在过程中把握这事物的物质形式一样，那么我国的实际是什么呢？“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¹⁴如果说，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形式，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显示的，则是社会主义的过程或运动形式，是在其发展过程和运动形式上反映出的发展程度和具体质的规定。这一发展程度和质的规定，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界分了正误，指明了前进的路线，规范了我们的认识和行动，使我们有可能避免大的曲折和错误，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正如江泽民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进一步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现在正处在改革攻坚突破的紧要关头，改革的锋芒直指我国具体制度或体制的根本缺陷。这个缺陷，从一方面看，反映我国的具体制度或体制严重脱离了国情，从另一方面看，反映我国的具体制度或体制严重脱离了市场经济。近20年来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多有进展，但是在具体制度或体制的核心层次和关键部位上克服它脱离国情、脱离市场的根本缺陷，直到现在才得到实质性的展开，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才直接被触动。要使我国具体制度或体制符合于国情，就要按照国情而不是什么先验的原则来选择具体制度或体制，最终抛弃那些附着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不正确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直被我们视为神圣的模式而不能稍动；使我国的具体制度或体制适合于市场，就是要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来构造和完善我国的具体制度，借鉴和采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有利于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东西。过去我们借鉴采用的更多的是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今天，面对具体制度的深层改革，我们所需借鉴采用的还将特别包括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而这是我们改革以来在认识上和在工作上所碰到的最大的难题。于是，改革什么、借鉴什么、怎么攻坚、怎么突破，为什么现阶段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路线、政策和做法，为什么现阶段只有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都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去找到答案。

经过近 20 年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过风风雨雨的洗礼，经过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领会，全党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比过去成熟多了，自觉多了，这是我们夺取更大胜利的重要保证。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还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这些曲折和失误，很可能不是发生在要不要发展生产力，是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而很可能发生在对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认识和把握方面。因此无论当前还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可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

基础性原理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解析

以上两个原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理论体系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形成而言，它们起着奠基的作用；对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体系结构而言，它们起着主导作用；对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发展而言，它们又起着支撑作用。

邓小平经济理论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前面已经指出，我国的根本经验是两条，一条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一条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准确地、深刻地总结和概括了这两条根本经验，形成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和指导原则。并且厘定着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发展主线和研究对象，这个发展主线就是发展生产力，研究对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过程上的界定，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曾被载入 1956 年八大通过的党章和 1964 年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在“左”的认识影响下，这个目标多年来实际被悬空。很明显，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被割裂，看不到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甚至把抓经济、抓生产当做唯生产力论来加以批判；主要由社会主义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客观发展过程被取消，不承认基本国情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制约，不承认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致把反对空想、冒进的正確主张当做右倾路线加以拒斥，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被悬空。在这种情况下，用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便没有可能把现代化当做研究对象，当做研究对象的，只能是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注意力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大战。”¹⁶“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¹⁶他强调不管怎样表述党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¹⁷指出“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¹⁸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化是邓小平关注的中心，自然也成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由于现代化在主要方面是指高度发达的现代生产力，我们在确认邓小平经济理论以现代代作为研究对象时，可不可以表述为这个研究对象是生产力？我的看法是，一方面，不能简单这样看，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及其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和人类普通的现代文明要求发展变革的系统工程，而不只是生产力现代化。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研究对象不是生产力现代化所能包含的。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否定这一看法，因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中，生产力现代化毕竟是居于中心的方面，是启动和决定现代化其他方面的基础条件，所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研究对象，既要从其内容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来把握，又要在相互联系中突出生产力的中心地位。依据这种情况，我认为需要用经济学范畴来表述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重点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宣布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¹⁹“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的关系。”²⁰我认为，对于他们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一论断是对的，他们所研究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矛盾和秘密深藏在经济关系之中，只有研究经济关系才能揭开其矛盾和秘密，找到解开历史和变革历史的钥匙。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直接指导社会实践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来说，它所研究的是毋庸掩盖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而可以不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把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固置在经济关系上，而应当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着重研究生产力。这两个基础性原理还担负着按照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逻辑对全部理论起着体系结构的作用。第一，在体系结构中，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原理，首先被解析为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相结合的价值观。只讲共同富裕，不讲发展生产，只会导致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讲发展生产，不讲共同富裕，只会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使这个统一的价值观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概念，在发展目标上，发展生产体现为实现现代化，共同富裕体现为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并以此二者作为初级阶段的终结标志。在实现过程中，发展生产不是平均发展，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只能以先发展带共同发展，以先富促共富。这就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取向上，实现了生产与需要、手段与目的、目标与过程、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根本导向。第二，在体系结构中第二个层面是基本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经济现代化。其中包括经济现代化目标，三步走战略，产业结构及其重点，发展次序，区域布局，科技进步，经济周期（台阶论）等。它以生产力现代化为基本内容，构成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主体和核心层面。它直接依据并反映两个基础性原理的要求，揭示出国民经济各种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如目标与步骤、全局与区域、重点与其他、跳跃与调整、速度与效益、总量与人均等，从中抽象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规律，形成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第三，经济发展的动力，包括改革论、体制论、计划与市场关系论、所有制论、分配制论、先富共富论、经济特区论、对外开放论等。这一部分，特别显示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创造性活力。它依据两个基础性原理，揭示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矛盾，一个是主要矛盾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由主要矛盾派生的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是解决前一矛盾，改革经济体制是解决后一矛盾。解决后一矛盾是要解放生产力，解除旧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因而改革便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动力，被邓小平称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因此他特别关注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为我国的经济振兴、对外开放、步入现代文明开辟了道路。第四，发展条件，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精神文明建设，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对外关系及党的建设等。最后是经济辩证法及经济工作的策略和方法。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支撑它发展同样不能离开两个基础性原理。社会主义一经与发展生产力相联系并被定位在初级阶段上，它的经济范畴、概念、形式，以及经济结构、重点、布局和经济政策方针，都要与经济活动实践的需要相适应，要依据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走的路还很长，经济生活将会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和更深刻的层面上发生巨大的变化，把一系列新的矛盾、问题、难点显露出来，要求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回答。这将成为邓小平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源泉。发轫于两个基础性原理的邓小平经济思想，将在新的生活实践中永葆活力。当然，我们不可以把它当做教条，以为它的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都能万古不变，永远正确。邓小平理论不是那种万事皆务于前，万物皆备于我的东西，它永远随着生活实践前进，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发展，推陈出新。人们在未来对邓小平理论某些思想观点的突破，正如邓小平理论对前人理论的突破那样，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非但不是邓小平理论的什么缺失，反而是这一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这些突破和刷新的思想和观点，愈是贴近实际，愈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就愈是符合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基础性原理，愈是能为邓小平经济理论所包含。

注释：

- 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64~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2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1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288、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66~36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10 1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828~8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3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14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5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 17 18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276、276、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2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0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2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吴琼）